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力挽狂澜

□ 杨 慧

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由亚非国家自行发起，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各国有关问题的大型国际会议。面对殖民国家的百般阻挠和破坏，周恩来以求同存异的外交智慧力挽狂澜，保证了会议的圆满成功。万隆会议对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提升中国的国际威望具有关键意义，也是亚非国家团结合作的里程碑。

不畏赴会险阻,彰显领袖担当

二战后，亚非人民的民族意识迅速增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运动蓬勃发展。但是，殖民主义在亚非地区的统治并没有结束，新独立的国家面临许多难题，迫切需要加强团结合作。为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巩固民族独立，1954年12月，印度尼西亚、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斯里兰卡）五国联合发起召开亚非国家会议，邀请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29个亚非国家参加。会议选在印尼风景秀丽的山城万隆市召开，因而也被称作万隆会议。中国政府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派出了以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为团长，副总理陈毅、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等组成的代表团参会。

自1955年2月开始，周恩来即着手会前准备工作，考虑到了参会面临的复杂局面。在参会的29个国家中，仅有7个国家与新中国建交，其他的21个国家，有的与新中国不曾有过来往而心存疑惧，有的甚至与国民党当局保持着“外交”关系。更为惊险的是，得知中国代表团参会的消息后，国民党当局策划了谋害周恩来的阴谋计划。4月11日，台湾国民党驻香港特务机关指使在香港

启德机场工作的地勤人员周驹，在中国代表团包租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经过香港机场时，在机舱附近放置了定时炸弹，导致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周恩来因事先应约去仰光同缅甸、印度和埃及总理会晤，临时改变了行程，国民党特务谋害周恩来的阴谋未能得逞。

面对险象丛生的局势，党中央为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安全焦虑不安，提出换人接替周恩来参会。周恩来却处之泰然，凛然无畏，坚定地表示：“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强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4月17日，中国代表团如期抵达万隆，受到当地群众和各国记者的热烈欢迎。

展现外交智慧,拨正会议航向

4月18日上午，万隆会议顺利开幕。在18日下午至19日的全体会议阶段，大部分国家代表的发言都表达了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谴责，呼吁扩大亚非国家间的团结合作，促进经济和文化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然而，由于与会国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再加上西方国家的煽动和干扰，少数国家代表在发言中重提反共观点，甚至将矛头直指中国。如污蔑共产主义是“独裁”，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要“同美国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等。这些发言明显偏离了会议主题，使会场气氛陡然紧张，中国代表团如何回应受到高度关注，处理不慎，会议将陷入混乱和分裂。

对于这一突发状况，周恩来临时决定将此前准备的发言以书面形式散

发，利用休会间隙，重新起草补充发言提纲。在正式发言中，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表明，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目的“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求同存异”理念的提出不仅表明了中国代表团的诚意，而且为化解国家间的分歧提供了有效方案，在关键时刻避免会议误入歧途。接下来，周恩来深刻地论述了亚非国家间具有广泛的求同基础，并就此前各国代表在发言中提及的不同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和颠覆活动问题进行了逐一回应，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政策，消除他们对中国的误解。短短18分钟的发言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说服力，赢得了会场热烈的掌声，为会议找到了一条避免对立继续进行的路线，成为会议走向成功的转折点。

在此后几天的会议中，各国代表对于会议决议和宣言的起草问题又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周恩来竭力化解矛盾，使会议尽可能地表达出亚非人民反殖民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共同愿望，抵制了以反苏反共为名将会议拖入思想意识论争的企图。正如美国记者鲍大可所评论的：“周恩来并不打算改变任何一个坚持反共立场的领导人的态度，但是他改变了会议的航向。”

中国外交的新起点,亚非合作的里程碑

万隆会议为新中国提供了与其他国家自由接触交往的机会，对打开新中国外交局面、拓展新中国外交空间、提升中国国际威望具有重要意义。在为期7天的会议中，除了参加大小会议外，周恩来广泛结交亚非各国领导人，特别是当时尚未建交的国

家领导人。据当年跟随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为了充分利用这次宝贵的机会，周恩来不断地参加一系列的午宴、晚宴和外交会谈，7天总共只睡了13个小时。轻松惬意的会外接触与正式会议发言相得益彰，消除了与会国对中国的疑虑。从万隆会议结束到1959年底，同中国建交的尼泊尔、埃及、叙利亚、也门、锡兰（斯里兰卡）、柬埔寨、苏丹等国都是亚非会议的参加国。

在亚非历史上，万隆会议是亚非人民团结合作的一个里程碑，也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划时代的创举。正如印尼总统苏加诺在大会开幕词中所指出的，“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亚非国家首次携手相聚，增进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合作，体现了亚非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决心和信心。会议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以团结、友谊、合作为核心的“万隆精神”传承至今，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万隆会议促进了亚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开展，标志着亚非国家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政治舞台。1955—1963年，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先后有摩洛哥、突尼斯、马来西亚等近40个国家获得独立，加速了全球殖民体系瓦解的历史进程。许多参会国此后成为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的成员，为促进南南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白乐夫原名罗尔夫·贝克尔，是一名德国共产党员。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医生，也是一位反法西斯战士。他曾作为军医在中国参加抗日战争，秉持国际共产主义精神为中国军民服务。

追随心中理想而投身革命事业

1906年12月12日，白乐夫出生在德国埃伯斯瓦尔德。他的父亲是一名药剂师，受家庭影响，他进入医学院学医。在青年时代，白乐夫就对纳粹的残暴统治深恶痛绝，对民众的悲惨遭遇深感同情，这样的经历和思想也促使他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因为崇敬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他到了中国后为自己取名白乐夫，他说：“我姓白，白求恩的白。我是一条快乐的汉子，所以叫白乐夫。”

1936年7月，佛朗哥在德国和意大利政府的武装支持下，发动内战，妄图颠覆刚刚成立的西班牙民选共和国。得知消息的白乐夫义愤填膺，辗转丹麦、比利时、法国，于次年2月27日抵达西班牙阿尔巴塞特，作为军医参与西班牙内战，实现了他投身革命的理想，但由于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失败，白乐夫也被关进了集中营。

但是白乐夫对于革命的向往没有改变。1939年，他响应国际医药援华会的号召，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参加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争。正如他说的，“当年，西班牙反法西斯斗争失败后，我们就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和苏联上”。他希望在这里看到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1939年5月20日，白乐夫与奥地利医生严斐德、捷克医生纪端德乘坐货轮，从英国利物浦出发，押送国际医药援华会筹集的捐款、药品和医疗器材来到中国。经过一个多月的漫长旅程，他们到达香港。由于当时中国沿海的港口被日军占领，白乐夫一行人绕道越南，再从广西入境，最后到达当时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所在地——贵阳图云关。

在中国行医过程中不畏艰难救死扶伤

经过短暂的休整，白乐夫等外国医生和中国医生混编成若干医疗队奔赴各地。在医疗队的8年时间里，白乐夫去过中国许多省市，包括贵州、湖南、江西等地。

由于饱受战火多年，前线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都极其恶劣。在行医过程中，白乐夫及同事早已将住茅草屋、睡竹板床、吃糙米饭视为家常便饭。而1把小刀、1个钳子和7个血管钳，往往就是一台手术的全部器械。尽管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白乐夫依然秉持作为医生的职业素养，坚持在红十字旗帜下工作，为中国抗战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在随军队行医的过程中，白乐夫目睹了日军轰炸和杀戮对中国普通百姓造成的伤害，心情十分沉重。但眼前残酷的现实也激起了他的斗志，使他更加忘我地工作，最大限度地救治中国军民。在中国的行医过程中，白乐夫不为名利，一直将救治中国人放在第一位。在江西修水县，由于伤员众多，高强度的工作和虚弱的身体状况使白乐夫感染了斑疹伤寒。幸亏得到八路军及时的医治，他才死里逃生。

1944年，白乐夫受红十字会的委托，在云南楚雄建立野战医院。尽管困难重重，但是白乐夫总能想办法克服。例如，他们在两个椅子上架个板子，在木板上挖个洞，就可以让伤员躺在上面当作病床。为了对付伤病员身上的虱子，白乐夫想出了用热水蒸气杀灭跳蚤的办法，使得医院一直保持没有跳蚤、没有虫害的纪录。一位放养的小男孩被狼咬伤，肚子被咬破，一部分肠子都掉了出来，但幸运的是肠子没有破。白乐夫为其洗净伤口，将肠子复位，并在伤口上安上了引流管。小男孩的家人得知后对他感激不尽。面对中国人的称赞，白乐夫总是“感到自己十分渺小”。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作为医生，感到满足的最美好的经历是：我坐在奄奄一息的垂危病人床旁的一张小椅子上，能够对病人进行输液抢救。当液体还在慢慢地进入静脉的时候，我看到病人苍白的脸又开始变样、变红，复苏起来。”

在来到中国7年后，白乐夫如愿去了解放区。1946年夏天，白乐夫跟

白乐夫：参加中国抗战的德国「白求恩」

□ 王坤



随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乘坐一艘装载粮食和医疗器材的轮船，从上海来到山东烟台。在胶东期间，他参与了在当地大为流行的黑热病的救治工作，这种病容易导致患者腹部肿胀，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致人丧命。在救治过程中，他还在当地建起一所小医院，培训了许多医务人员，在他和同事们的努力下，疫情最终得到了控制。在中国奋斗和工作了8年后，白乐夫于1947年底返回德国。

中国成为他一生牵挂的地方

回到德国后，白乐夫在马丁·路德大学担任教授，后又出任专区政府卫生部部长等职。民主德国政府先后授予他“国家功勋银质奖章”“反法西斯战士勋章”，德国红十字会授予他金质奖章和“人民医生”光荣称号。

离开后的白乐夫仍一直牵挂着中国。家里到处摆放着中国的陶瓷、字画和书籍。他常说：“在中国的八年，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八年。”“我一直牵挂着那些在我一生中工作和生活得很有意义的地方，很想看看它们所发生的变化和现状。”

1985年，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白乐夫第二次访华，他先后参观了其工作过的贵阳图云关、云南楚雄和山东烟台。在楚雄的参观中，当他得知曾经的飞机场和野战医院变成了良田和粮库时，白乐夫感慨：“四十年，变化太大了，太大了！”他的脑海中充满了曾经的回忆，临走时，他将自己珍藏了40年的照片留在了楚雄。

为纪念在中国的行医经历，白乐夫出版了回忆录《我在中国当医生》，详细记述了他在中国的行医经历，并向世界介绍了真正的中国。这部回忆录已被翻译成多种语种出版。

1999年12月12日，白乐夫以93岁高龄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他作为医生自愿援华并不遗余力地救死扶伤的事迹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重，他投身中国革命的壮举也为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贡献。

龙的存在、传说与图腾

□ 李萝卜

龙是原始图腾，是中国人眼中神圣的存在。几千年来，龙的形象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创造过程。宋代罗愿在《尔雅翼》里这样描述它：龙有鳞虫那么长，和九种动物比较像，它的角似鹿、头似蛇、眼似兔、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背上有81块鳞片，乍一看仿佛是用几只动物器官拼接而成。

人们不禁怀疑，龙真实存在过吗？原型是什么？龙是怎样成为一种拼接生物的呢？

（一）

龙对于现代人来说或许只是一个虚拟象征，但在历史文献里，龙这种生物在上古时期就真实存在。商周时期的甲骨文记载了人们屠龙、御龙、食龙甚至养龙之事，那时龙不仅肉眼可以看到，用手可以摸到，甚至你想尝一尝它的美味也并非不可。

《左传》记录了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秋，在晋国的绛都出现了一条龙，大家很想擒获它，但苦于对这种陌生动物了解太少，而迟迟不敢下手。于是，贵族魏献子就去请教当时以博学著长的太史官蔡墨，蔡墨说：“你们不能杀龙真是太无能了，要知道过去的人们不仅能活捉龙，还设有专门养龙的官，只是后来大地上水泽变少，龙才越来越少见，以至于你们一看到龙都吓坏了。”为了证明龙在上古时期是常见的动物，蔡墨又引用《易经》里“龙战于野，若朝夕见，谁能物之”，称若非天天都能看到，谁能把它描绘得这样清晰呢？

不过，现代人对龙的看法依然有很大争议：龙真实存在过吗，又或者

完全来自人们的臆想？有人认为龙曾经是活生生的动物，原型是蛇、蟒、扬子鳄、鲸等；也有人认为龙从一开始就是子虚乌有的。龙的原型虽至今无法证实，但关于它为什么会变成现在的这样的拼接生物形象，却可揣度一二。

距今一万年左右的“鱼尾鹿龙图”，大概是考古发现最早的龙的形象了，那时的龙纹还比较粗犷，模糊不清，没有统一的形象特征。距今约五六千年的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猪龙”，龙的吻部突出，近似猪的模样，而身躯却弯如蛇，在制作上形成了规范，是商代龙的前身。

图腾崇拜的结果是龙逐渐被神化，形象也越来越完善和清晰。商代对“龙”形象有革命性的改变，妇好墓出土的“龙纽石器盖”既承载了红山玉龙的基本形制，还加了角和足。给龙添角是很有意思的，龙的角又叫尺木，在古人看来“龙无尺木，无以升天”，没有角的龙是无法飞天的，神性也就差了点。总体上看，商代的玉龙头部比较大，张口露齿，头顶有角，神性张力十足。

战国时期的“龙”则表现出了强劲的力量感。被神化的“龙”还须有强大的力量，不仅能飞天，且有摧枯拉朽之势，不然如何让人信服呢？至今发现的最早的帛画《人物龙凤帛画》中，绘有一条蜿蜒向上的卷尾龙，身上有纹饰，长有双足，和蛇比较接近。而另一幅战国《人物御龙帛画》中，龙的鼻前有须，腹部有鳍，有四只脚，脚趾如爪子一般，兼具了鱼和禽类的特征。战国时期出土的玉龙，较之商周少了卷曲之态，多了些力量之美。

相比较之下，汉代的龙更是有所不同，汉代的龙分为飞龙和走龙，飞龙普遍长了一双翅膀，可能和道家羽

化登仙的信仰有关。从整体上看，汉代的雕刻玉龙在力量和气势方面都是空前绝后的，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透雕龙纹玉环，体态卷曲作疾驰状，挺胸翘尾、四足强健、威风凛凛、充满活力，展示了龙的气势。

到秦汉时期的龙纹基本定型，有足、爪、须、鳞甲、长角，形象趋于完善，后世多在此基础上作大同小异的调整。龙成为复杂拼接生物的过程，也是对它神性想象的完善过程。

（二）

不仅我们有龙文化，西方也有不少关于龙的传说。中西方的龙都很像拼接的怪兽，但西方龙的形象不甚统一，较之中国龙差异也大。《圣经》描述的龙形状多变，不像像蛇，还有像鳄鱼、熊或豹的形象。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里，龙要么像巨型蜥蜴，长着蝙蝠的翅膀，身上有鳞甲，并且能喷火；要么像一条大蛇，尾巴带刺。从龙的词源希腊文δράκοντας来看，它最初的原型就是大蛇，后面不管怎样变化，蛇是它的底色。

闻一多认为图腾未合并之前的所谓中国龙者，也是一种大蛇。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部落，兼并了其他形形色色的部落，吸收了他们的图腾标志，顺便融合了兽类的四脚、蛇的头、鬃的尾、鹿的角、鹰的爪、鱼的鳞和须，成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龙。无论中国龙还是西方龙，都有原型是蛇或鳄鱼的说法，会飞并有着强大的战斗力，只是在龙的具体形象上有很大差异。

但中西方对待龙的态度却截然不同。西方的龙常被看作暴力、邪恶的化身，形成了屠龙的传统。神话故事

里的屠龙者往往被看作除暴安良的英雄，《圣乔治与龙》描绘了一条住在湖中能喷毒气的龙，人们需要定期用羊甚至活人来祭祀它，以免家园被毒气肆虐。有天使乔治路过湖边，看见一位美丽的公主正被献祭，他心生不忍，与龙拼死决斗并最终砍下了恶龙的脑袋，大快人心。

在中国，龙主要是祥瑞的化身，人们不仅崇拜龙，还想象与龙有着精神和血脉上的联系。龙自古被认为是最智慧和神秘的生物，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人们就把君主或才俊之人比作龙，龙的神性光环也越来越光芒四射。吴越国的开国君主钱镠很勤政，平时工作很辛苦，经常熬夜加班。但是他的时间还是不够用，为了不贻误政事，他让人特制了一个圆木小枕头，小枕头的两边有铃铛，一翻身铃铛就会响，钱镠也就被唤醒了。如果唤不醒，钱镠还有第二套方案，就是让侍女手摇一个特大铃铛，直到把自己唤醒为止，后人称赞钱镠是“不睡龙”。

由于古代中国人对自然了解不多，发生自然灾害后往往束手无策，因此龙在中国还有一个重要职能就是“水神”。“龙，水物也，必致雨”，龙既是水神，也是水物，既有神性，也有兽性，因此农家向龙祈雨的过程，可以看出民间和龙的关系更加轻松、活泼。

